

都市化进程中华南宗族的演变动态： 以南景村为例

高 崇

(香港大学 社会学系, 香港)

[摘要] 20世纪40年代以来,在国家现代化发展计划的强力推动下,大城市郊区农村及其宗族组织被卷入到都市化进程中。宗族虽然被官方列为都市化进程的客体,但在地方社会中依然具有主体能动性,与不断成长的都市现代性互动。广州市郊南景村个案考察表明宗族的能动性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宗族与国家认可的村庄正式权力结合;二是族产的公司化经营管理;三是努力从祭祖中建构和发掘适应当代市场社会需要的象征资源,祭祖观念也开始顺应社会文化的转型。宗族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方式,不仅没有把自己跟现代化话语对立起来,而且通过经济发展提供的良好条件得以再组织和延续。

[关键词] 都市化;宗族演变;传统的再组织;华南宗族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942X(2005)03-0137-08

华南地区的宗族自明清以来在乡村社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乡村和城市不是完全割裂的,随着城乡人口的流动,一些宗族成员进入城市,他们把宗族和城市连接起来,所以,学者们注意到都市语境中的宗族问题^{[1][2]}。他们的研究包括移入城市的宗族成员与自己所属的乡下宗族的关系,联宗组织在城市中的建构等。一般的看法是,都市环境会阻碍宗族的发展,隐含的意思是宗族会随着都市发展而自然消亡。Baker认为,在城市中,宗族成员难以分享共同的族产,他们的职业分化、社会流动和地理流动都非常大,他们也不再依赖宗族的安全保障,这些因素导致宗族的分裂和解体,而为了适应城市生活而建构起来的联宗组织和宗亲会则得以存在和发展^{[1](pp.502-518)}。相对来说,都市化程度越高,宗族把成员组织在一起的可能性就越低。

另一方面,都市化的起步把城市郊区乡村卷入到都市生活中,不再是少数宗族成员进入都市,而是整个宗族被笼罩在都市阴影中。华人社会中,香港地区的都市化起步相当早,所以,20世纪50年代之后,西方学者把香港作为研究中国社会的实验室的时候,已经观察到新界的许多宗族正在从传统家族组织向现代的公司法人转变。华琛(James Watson)发现,新田文族人不愿意在工业化中成为工厂劳工,转而移民欧洲开餐馆,但在移民和创业中仍然保持着宗族的组织形式,他预言宗族能够适应现代社会,传统宗族可以转变成都市宗族而延续下去^[3]。Potter在新界屏山村看到,都市化中,由于村民进入都市工作,宗族的功能和文化表现有减少和简化的一面,但是还有一些因素在维持宗族的存在^[4]。宗族组织已经在高度分化的社会和经济中存在着上百年,它依然可以被整合到新的社会、法律和行政框架中。村民的选择和他们的能动性在保持宗族过程中起到很大作用。所

[收稿日期] 2004-09-30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作者简介] 高崇(1975-),男,安徽凤台人,香港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候选人,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人类学、城乡结合部社区的都市化及移民创业等。

以被淹没在都市中的宗族是解体,还是随着变化了的环境而改变,延续一、两代^[5],或者更长时间,关键取决于宗族成员自身的决定和努力。

近年来,国内人类学界对宗族在改革开放和都市化过程中的重建和转型给予很高的重视^{[6][7][1]}。这些研究或者围绕宗族复兴的社会背景和社会条件,或者探讨宗族复兴引发的各种所谓社会问题,关切点集中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上。而真正从经济条件变化,特别是都市化角度探讨宗族转型的研究还很少。从香港新界宗族的研究中发现,都市化带来的经济环境的改变,例如新田村的海外移民创业和屏山村民到都市工作,都对宗族造成很大影响。当然,都市化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改变的综合过程,我们在强调经济的同时,对其他方面也不应该忽视。

本文检视广州城乡结合部的南景村^②的宗族面对国家主导的都市化进程,是如何运用各种文化策略去巩固自己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基础,从中透视华南地区宗族与都市化发展之间的交错关系。全文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简单介绍南景村的宗族情况和都市化的起步;第二部分围绕宗族组织的现代转型,主要分析宗族的组织形态在都市扩张中的适应性改变;第三部分讨论族产如何在都市化中得到维护,族人用现代经济方式经营族产;第四部分探讨宗族文化跟现代市场经济观念的结合,理解祭祖的现实意义;最后的结论主要是反思都市化跟宗族组织之间的微妙关系,特别是宗族如何化解都市化带来的冲击,甚至反过来把握都市化带来的机遇,巩固自身。

本研究的资料采用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搜集,分两期进行,即2000年2月到5月和2002年7月到2003年8月。笔者在村里租房居住,主要进行参与观察(如祭祖活动)、访谈村民和村中干部(重点报道人55个)、收集地方文献等工作。南景村是广州139条“城中村”之一^{[8][p.7]},比较完整地经历了从一个传统农村到“都市里的村庄”的都市化过程,非常具有代表性。

一、南景村宗族和都市化起步

南景村是位于广州市海珠区中山大学附近的一个自然村,解放前属广东省番禺县河南岛敦和乡十一段,距离广州市中心约6公里。据1949年的统计,全村共有1075人,251户人家^③,村里总共大约有200间房屋,成片地挤在一起,大体形成一个“T”形^[9]。

(一) 宗族的传统形态

近代华南和东南地区是宗族组织异常发达的地方^{[10][11]},南景村也不例外。本村是个多姓村,主要有车、莫、何、伍、王五个宗族,其中车、莫两个宗族人多势众,控制着村民社会生活的绝大部分。车、莫两族的开基祖都是在元末明初迁来的,车姓来自广东博罗,莫姓由南海平洲分支而来。伍姓在宋朝时从河南经南雄珠玑巷迁来广东。随着人口的增长,开基祖的儿子们自立成为房支。这个过程就是宗族在迁移中的异地重建^[2]。在这种单系继嗣而且人口流动性低的社会中,血缘关系伴随宗族成员的生活地域扩大而扩展,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12]。

本村宗族事务由各族的父老会议和值理共同管理。父老会议是一种决策机构,由本族中年满60岁的男子组成,对族中事务做出决议,然后交由值理去执行。这和其他以族长为首的宗族是不同的,实际上是把一些家庭的家长抽调出来管理族中事务。父老权力实际上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

① 参见张小军《再造宗族:福建阳村宗族“复兴”的研究》,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博士论文,1997年。

② 南景是依学术惯例为保护研究对象而取的学名。另外,为了行文的一致性,文后所附参考文献中出现的村名也以“南景”做了相应的替代。

③ 参见正宝杰《南景村家族与祭礼调查》,岭南大学社会学系毕业论文,1950年。

教化权力(Paternalism),依传统行事,是长老政治的一个典型^[12]。值理是根据父老会议决定管理族产的人。本村的值理由各房轮流选出合适的人选担任^①。

宗族拥有强大的经济基础,村中大部分土地为宗族所有,如莫姓所有田地60%以上为族产,车姓所有田地则有近一半为族产。除此之外,莫姓在中山万顷沙(现属番禺)还有数百亩族产,除去各种开支,尚有3万石(3000000升)左右谷的盈余;而车姓族产除土地外,还有店铺、池塘、果树等。有了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基础,宗族便可以组织各种活动以加强成员之间的联系,巩固内部的团结,增强宗族的影响,如建祠堂、组织祭礼活动、办学、赈灾等。

集体性的宗族活动主要是族祭,包括开灯、清明祭扫和春秋二祭等。祭祖仪式或在祠堂、或在太公墓地举行,参加者只限本族男性。“参与到这种仪式时,个体成员感到他不是孤单的,而是一个由割不断的血缘纽带连接在一起的大群体的一员。如果说宗族在其成员的日常生活中是一个抽象形象和集体感受的状态,那么现在宗族以具体可见、有血有肉的形象展现出来,向他表明自己作为其中一员的宗族的巨大力量和荣誉感。因此,整个仪式过程有提升族人的感觉和思想到个人存在层次之上,并把他们整合进群体的团结和延续中去的作用。”^{[9](p.97)}

(二)都市化的侵蚀 20世纪30年代到解放

都市化不仅仅是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过程,更重要的内涵是传统的农村生活逐渐被城市生活方式“侵蚀”的过程。以往的都市化研究过于强调人口的职业分布和地理分布,只看到表面现象,而对现象背后的意义很少触及。人类学的都市化研究兴起之后,把研究重点转向都市化隐含的文化变迁,把都市化理解为“生活方式从乡村生活向都市生活转变的过程”^{[13](p.30)}。本文采纳这种理解,从都市政治、经济、文化等对村庄生活的渗透角度来探讨都市化和宗族之间的互动。

经过陈济棠主政广东期间的经济建设,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广州初步显现出现代经济的面貌,南景村跟随广州踏上了现代化的道路。随着新港路的开通,以及汽车、汽船等交通工具的使用,本村同广州之间的距离大大缩短。南景村的村民可以看到当天广州的报纸,可以很容易地参加城里的社会活动,因此,村民们越来越多地受到城市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的影响。新式教育的输入和出洋谋生者带回来的信息也拉近了南景和都市生活之间的距离。本村历来重视教育,村中36%的村民受过不同程度的教育,约75%的户主受过新式教育。村中成年男子约有一半曾外出谋生,且大多在广州、香港、新加坡、越南居留过,一般都在三年以上,甚至有长达二十年的。这些人或多或少地接受了现代观念的熏陶,他们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各种城市观念和生活方式带回村庄,冲击着传统的村庄生活^②。由于生活圈子的扩大,宗族对村民的人身控制大大减弱,宗族观念也受到一定的冲击,特别是年轻一代不再笃信族老的权威,他们甚至会直接挑战父老。

虽然由于邻近城市的地理位置及交通条件的改善,外来观念及生活方式日益深入到村庄生活中,本村社会结构也得到逐步的变革。宗族这类村民的基本社会组织在村落生活中的地位逐渐下降,但是并没有被外力强制解散。

二、都市化中的宗族组织

解放后,南景被广州市指定为蔬菜生产区,专门负责生产各种蔬菜供应城市市场。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实行户籍制度,村民被划分为菜农户口,吃国家供应的商品粮,他们实际上不是种粮食

① 参见刘耀荃《南景村的权力结构》,岭南大学社会学系毕业论文,1950年。

② 参见钱楚文《南景村娱乐活动的研究》,岭南大学社会学系毕业论文,1951年。

的农民,而是跟城市市场联系在一起的蔬菜供应商,他们已进一步纳入城市系统之中。

在国家发动的一系列社会改造运动中,经过土改,划分阶级,组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村民在官方话语的宣传中认识到宗族内部也有压迫和剥削,对被划为地主阶级的父老,也同样与其斗争。阶级观点的提出,实际上是试图重新整合村民,消解血缘关系在村民的经济生活以及生产方面的影响。城市政权要求村庄按照官方规定建立新的社会组织,但是由于居住格局没有改变,村民对新的社会组织方式也不熟悉,他们实际上还是在宗族房支基础上建构村庄正式组织。例如,生产队的划分基本上也还是根据村民的村落居住格局,一生产队陈姓多,二生产队以莫姓为主,其他四个生产队都是姓车的。陈姓人解放前是村里的佃农,后来土改时在村里分到了田,成为世居村民。

国家发动的各种运动进一步淡化血缘观念,在村庄中建立起政府组织,使村民在经济上、政治上、社会关系上、思想上不再依靠宗族组织。权威由父老转移到支部书记、大队长及其他村干部身上。但是,因为村庄的聚落形式没有改变,村民仍然按照宗族、房支分区居住,再加上口粮、户籍严格限制了村民的流动,宗族依旧潜在地在村庄事务中发挥作用。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南景村的交通条件得到很大改善,新港路拓宽,广州大道修成通车,两条路在本村东北部交接,形成一个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公共汽车也增加了班次。而广州市区特别是旧城区,人口密度过大,许多单位不得不向交通方便的城郊地区迁移,南景村这时成了一些单位迁移的目的地,如广州电器科学研究所、广东省卫生防疫站等^{[4] pp.52-151}。陆续有十多家单位迁入。征地补偿包括征地费和转户口,前者为本村的发展提供了启动资金等。村民的收入因为征地赔偿和出租房屋增加较快,消费水平大大提高,许多消费指标超过了广州市职工家庭平均水平^①。广州城区的扩展,一方面使南景村同市区紧密联系在一起,扩大了村民的生活圈子,让他们更容易地走近城市生活,另一方面,通过搬迁城市单位、工厂和居民,把村庄纳入了城市体系。但是,这类被动的都市化给村庄生活造成很大压力,毕竟村民对都市生活还是有些陌生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南景村在1982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村民以联合承包或个体承包等形式组织生产,并仍然以种菜为主。虽然在国家主导下建立的大队和生产队仍然以行政村和生产社的形式存在,但是,它们组织村民的能力已经比人民公社时期大为下降。相比之下,宗族活动能力重新显现,车姓把他们占绝大多数的三、四、五、六四个生产社联合成为一个小联队,而把整个村称为大联队。小联队主要管车姓的事情,如拜山、分配祠堂收入等。由于祠堂的族产是以小联队的名义保存下来的,所以少数小联队的成员不是车姓的,不参加车氏祭祖,但他们可以参加车氏祭祖后的宴席。此外,祠堂发放的老人金、年终分红等,小联队的成员也有。宗族成员和小联队成员不完全重合导致族产的分配也不能像以前那么严格限制在宗族之内。小联队不管各个生产社,只管自己的一些物业,如厂房、商铺等。小联队的委员由四个生产社的社长出任,但一定要是姓车的,由于三社社长不姓车,所以小联队的事他不参加,而由姓车的副社长代替。经过这样的转换,宗族组织隐藏到村庄正式组织的背后,避免了跟国家话语的矛盾和冲突。

宗族组织向正式权力的渗透还表现在村委会选举中的拉票。如2000年南景村按照上级的要求搞村委会选举,参选的几个候选人除了一般的请吃饭、花钱买票之外,常用的拉票手段还包括挑起村民的宗族意识,所谓“选自己兄弟,不要选外姓人”,甚至在各个房支中找支持者打电话拉票,以同房兄弟的感情笼络票源。选举的结果是车姓人胜出,因为他们族人多,人心齐。

由于宗族活动被国家定性为封建迷信活动,村民创造性地在小联队名义下进行实际上的宗族活动,把宗族作为一种经济性实体来经营,避免与城市政府发生正面冲突。村民们巧妙地掌握和利

^① 参见郝令昕《南景村的农民家庭和家庭消费——一个都市近郊农村社区的变迁》,中山大学社会学系1985年编的《社区研究论文集》第4-61页。

用国家话语为自己的宗族活动找到合法性的基础。宗族在正式权力的挤压之下，改头换面，与正式权力的延伸形态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开放性的社会组织。

三、族产的公司化经营

从宗族现在的组织形式上看，车氏宗族实际上同村里的小联队融合在一起，试图以一种经济实体的形式出现。解放时，族产按规定是要收归集体的，然后又分到家庭，但是本村车姓只把族产中的土地按照规定处理了，其他一些商铺则收归集体，以生产队的名义保留了下来。这些族产包括广州市某中学门口那条路右边的商铺以及南景西街的几个商铺。20世纪80年代初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他们也没有分这部分族产，这成了后来宗族运作的经济基础。实际上，他们一直利用这笔族产暗地里祭祖，即使在国家不允许的情况下也暗中进行。

还有一部分族产则是利用都市化带来的经济机会新增加的。1985年，在香港某车姓富商的倡议和捐助下，车济美堂择新址重建。据说当时不敢说是建宗祠，上报是华侨捐资兴建老人活动中心，三、四、五、六四个生产社出地皮，车姓富商出钱。祠堂建好后，还在旁边建了一栋厂房供出租。利用这些厂房、商铺的租金收入滚动发展，陆续在祠堂旁边又建了两栋厂房。所以现在族产主要是这些厂房和商铺，以及所收上来的租金，每年总收入在50万左右。因为广州最大的布匹市场在20世纪90年代初从市中心搬来南景村附近的郊区，带动周边地区的制衣业发展，很多外地人来这里开设制衣厂。房屋租金，特别是厂房租金上涨很快，从六七元迅速涨到十七八元。当地生产社和行政村都利用手中掌握的土地建厂房出租，获利甚丰，当这些生产社的领导面临如何增值族产的时候，他们很自然想到建厂房出租的办法。莫姓近年把废弃的如谅祠加以整修，单层改建为多层，地层的厅、走廊出租给别人经营桌球室，上面出租给人开制衣厂。可谓宗族与现代经济的巧妙结合，既保存了祖先的有形存在，又利用祠堂提供的空间来赚钱。Watson担心这些将族产建立在都市财产上的宗族是否可以像建立在乡村财产上的宗族那样延续几个世纪⁵ [p.614]。

车姓祠堂和族产由六个人共同管理，一个会计，四个生产社的社长，一个所谓“堂长”，由村长任命（现任堂长是以前车姓村长任命的）。小联队每年一次的祭祖上就要十几万，春节给车姓老人（男60岁以上，女55岁以上）发老人金，2000年是每人500元。年终还给姓车的四个生产社分钱，一个社5万。这样的祠堂在经营上如同法人公司，族产被当作现代公司的资产来经营。

四、宗族观念的转变

宗族观念最明显的外在体现是祭祖（广东人称为拜山）。即使在祭祖活动被国家严格禁止的时候，村民还是在清明的时候偷偷去拜山，他们认为子孙后代有义务拜祭祖先。文革的时候，一边搞破四旧，一边依然有村民暗地里去拜山。当然，本村各祠堂已经收起或烧掉神主牌，祠堂或者改为托儿所，或者用做生产队或大队的办公室，或者做了学校的校舍。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祭祖活动重新公开举行，但是对参加祭祖者的资格没有严格限制，女性也可以参加，例如外嫁女和娶来的媳妇。甚至连姓车的女婿都可以参加，有些女婿还带自己的朋友一起去。到了太公墓地之后，他们大声说笑，之后还赌博，让老人们觉得对祖宗不敬，怨言很多。这些现象表明祭祖演变成了类似集体聚会的活动，参加者的资格不再严格限制在男性宗族成员。祭祖时安排学生专车，让族中小孩子从小接受宗族文化的熏陶，让祭祖可以世代传下去。

在都市化和市场化的强烈影响下，村民对金钱的渴望也反映在祭祖中。车姓人的祖坟在一块伸向湖中的岬角上，面水。2000年清明，笔者随他们一起去拜祭的时候，村民发现水涨至坟脚，都

十分兴奋,说车姓为水命,以水为财,今年水大意味着可以发大财。他们不仅在追忆祖先,而且把祖宗看作自己财运的保护者,可见经济观念对宗族的渗透。撇开迷信色彩不谈,族人主动把祭祖的文化意义跟经济观念加以整合,或许可以更好地保持祭祖活动。事实上,无法对当前社会文化进行象征解释的文化因素,是很容易被社会发展所淘汰的。祭祖后的祠堂饮宴也进行了重新定义。20世纪90年代以前,村人的婚丧宴席以及每年清明祭祖之后的宴席一般都摆在祠堂,因为那里的地方够大,又有专门的桌凳、厨房、碗盘,供村民们公用,只要交很少的租金就可以了。只是随着村民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他们觉得在祠堂摆酒档次太低,不够大方,面子上过不去,于是改为到外面的酒楼去摆。

此外,村民在取名时仍然选取一些标示辈分的行第字。村民从解放前开始,取名时就很少用祠堂规定的行第字了,但他们自己知道属于哪一个字辈。车氏祠堂的会计,也是车族中的族老告诉笔者说,他这辈是“家”字辈,在祠堂的名字是“家咸”,但他一直使用的名字是“业漆”。他的另外几个兄弟取名为业明、业虾、业勤、业勇。这种情况在该村非常普遍,绝大部分有一个以上男孩的家庭,都在孩子的姓名中嵌入同一个表示同辈关系的字。虽然宗族排列的行第字不受重视,但是用行第字的习惯和意识还是在延续。

五、结论与思考

宗族这个父系血缘关系群体,在都市化进程的紧逼之下,不但没有消亡,而且利用经济发展提供的资源不断再造和自我延续。宗族组织如何在现代语境中寻求生存?它会走向何处?从本村情况看,族产确实在维护宗族组织的过程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族产的形式也以土地为主转向以适合现代经济的出租物业为主。都市化发展不但没有促使宗族解体,反而提供了族产再造和不断增值的机会,促进了宗族活动的开展,间接保证了宗族以新的形式保持下去。另一方面,宗族成员对国家话语的运用对宗族重建是必不可少的,没有一种合法性作为依据,特别是对国家的华侨政策的理解和运用,祠堂根本不可能重新修建。

都市化虽然带来大量的城市特质,但是,村民的基本文化逻辑和生活聚落没有被破坏。共同的聚居地是宗族能够长期得以保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4](pp.168-169)。虽然随着都市化而来的国家征地,一些村民转成城市户口被安排到城市单位中工作,但是,他们还是宁愿住在村里自己建的住宅里。聚族分房而居的基本格局没有太大的改变,这样维持了宗族的生命力。显然,村民的能动性和意愿对都市化进程中宗族的再造和维持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另一方面,城市郊区的都市化进程实际上是城市政府强力推动的,也伴随着国家权力对村庄的不断渗透。国家权力形塑着宗族组织的改变,车氏宗族就不单纯像香港新界地区的宗族改变为一个经济实体,还要与村庄正式权力机构的结合,取得合法化的形式。这是宗族在各种权力夹缝中寻找生存的一种策略。

现代和传统不是截然对立的两种话语。只要传统本身可以解释现代社会现象,给现代事物赋予意义,只要作为传统载体的社会行动者愿意动员各种资源去维护,一些传统事项可以经过再造在现代语境中延续。南景村宗族演变的动态机制其实就说明了这样的文化动态论^[5]。

[参 考 文 献]

- [1] Baker, Hugh D.. Extended Kinship in the Traditional City[A]. G. William Skinner.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499-518.
- [2] Freedman, Maurice.. The Politics of an Old State: a View From the Chinese Lineage[A]. John Davis. Choice and Change: Essays in Honour of Lucy-Mai[C].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1974. 68-88.

- [3] 华琛. 中国宗族再研究: 历史研究中的人类学观点[J]. 广东社会科学, 1987 (2): 70 - 72, 79.
- [4] Potter, Jack M. . Capitalism and the Chinese Peasant : Social and Economic Change in a Hong Kong Village[M].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68.
- [5] Watson, James L. . Chinese Kinship Reconsidered :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Research[J]. The China Quarterly , 1982 (92) : 589 - 622.
- [6] 钱杭, 谢维扬. 传统与转型: 江西泰和农村宗族形态——一项社会人类学的研究[M]. 上海 :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5.
- [7] 钱杭. 中国当代宗族的重建与重建环境[J].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 1994 (6): 76 - 88.
- [8] 李培林. 村落的终结: 羊城村的故事[M].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2004.
- [9] Yang, C. K. . Chinese Communist Society : The Family and The Village[M]. Massachusetts : The M. I. T. Press , 1965.
- [10] Freedman, Maurice. . Lineage Organization in Southeastern China[M]. London : The Athlone Press , 1958.
- [11] Freedman, Maurice. . 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 : Fukien and Kwangtung[M]. London : The Athlone Press , 1966.
- [12] 费孝通. 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 [13] 周大鸣. 论珠江三角洲的都市化[J]. 开放时代, 1995 (3) : 29 - 34.
- [14] 任高玉. 近郊农村的城市化——广州市海珠区南景村城市化研究[A]. 何肇发. 珠江三角洲集镇与居民——社会学的社区研究[C]. 广州 :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1. 138 - 157.
- [15] Malinowski, Bronislaw. The Dynamics of Culture Changes : an Inquiry into Race Relations in Africa[M].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45.

[责任编辑 徐丽静]

Dynamics of South China Lineage in Urbanization : the Case of the Village of Nanching

GAO Cho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Abstract : With national development projects since the 1940s, some villages in suburban areas have got involved into urbanization and the rural lineage organizations are turning into urban lineage. With the impetus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modernity penetrates and dominates most aspects of urban life quickly. Urban lineage mobilizes all the social resources to negotiate with complicated circumstances it faces in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urbanization. Villagers in Nanching, a village located on the outskirts of Guangzhou, employ their own strategies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First, a lineage organization is embedded into the formal power structure of Nanching. The urban government continues to construct and restructure formal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official, semi-official and autonomous institutions, to govern the local society. On the other hand, the members of Che Lineage reorganize their lineage in the name of Joint Brigade (liandui) in the 1980s and lineage activities are endowed with legal cover. Lineage also functions in the village elections. Second, the investor and management of lineage estate are based on modern market economy principles. After 1950, only some market stalls of lineage estate have been maintained while ancestral land was expropriated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The newly accumulated lineage estate has been the commercial industrial building for lease. The avenue of investment is used to support annual ancestor worship and social welfare in lineage. To some extent, the management of lineage estate can be considered as a modern trustee. Lastly, lineage

conceptions are re-interpreted in order to adapt to a modern society. Women are not excluded from ancestor worship any more. Although symbolic meanings of ancestor worship are rich and complex and culturally loaded, the villagers tend to amplify its meaning of "getting rich". The patronage of ancestor is employed to interpret their fortune of wealth in modern economy. The study argues that the lineage as a social organization does not contradict with modern discourse but reconstruct and maintain itself by the conditions offered by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 urbanization; dynamics of lineage; tradition and modernization; South China

谈大学出版社开发精品教材的整体运作

大学出版社是以出版大中专教材、学术著作及推动高校教材建设和教学科研工作为首要任务的。开发、出版高校精品教材是大学出版社的立社之本,也是大社与小社、品牌社与杂牌社的区别所在。从现有情况来看,大学出版社与非大学出版社(高教社除外)相比较,其优势就在于高校教材出版的力度大。这是大学出版社宝贵的资源和财富,也是大学出版社在原有体制下经过多年积累形成的优势,因此,不仅不能放弃,而且还需要进一步去整合、提高和发展,不仅要在量上继续发展,更要在质上有所超越。可以这么说,大学出版社要想在目前这种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脱颖而出,这是一个毫无争议的立足点。

要搞精品教材开发,就需要在出版社的层面上进行整体战略部署与规划。从现有以绩效挂钩的考核体制看,这种体制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充分调动每个编辑甚至每个出版社人员的创利积极性,但同时,这就注定了每个编辑的规划都是从个人层面进行的。或许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种自发的个人规划最终也会形成(或偶然形成)某种较全、较细的教材出版局面,甚至形成品牌,但出版社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则是时间及无序、重复的发展状态。因此,从出版社层面上进行整体部署与规划,可以说是从杂牌社跃向品牌社的必然阶段。

首先,从选题角度讲,出版社的整体部署与规划就是要对整个出版社定出一个明确的发展方向和整体开发思路,并用这种发展方向来统一全体出版社人员的思想。规划中不仅要有可信的理由来说服人,还要有明确可操作的政策来做出支持。在这个过程中,统一全社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与作用。现代企业绩效挂钩的考核体制使得每个企业成员首先要考虑绩效,因为绩效是每个人生存的根本。这就不可能要求成员不考虑绩效而强制其行为,除非不再以绩效进行考核,而这就要冒整个考核体制崩溃的风险。从政策支持角度讲,在目前机制下,就是对已经成熟的方向、领域(对于大学出版社而言就是高校教材出版)放开选题,而对于不成熟的、不熟悉的领域,则要在认清自己实力的基础上,既要大胆、激情的探索,又要紧守小心论证、一步一个脚印的规则,做到成熟一个领域,开发一个领域。

其次,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出版社要审时度势,通过对高校教材科学、详细的分类,规划精品教材。教材分类其实就是目录工作,这是一项基础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必不可少的工作。从一本教材目录就可以看出一个出版社在这一块出版领域的实力,以及对这一领域认识的深度和重视的程度。同样一本高等数学教材,既有文科用书,也有理科用书,既有经济类数学用书,又有计算机类数学用书。书名虽然相同,但适用的对象却大不相同。同理,同一个书名,还可分为专科用书、本科用书、研究生用书等。此外,还有区域、版本等区别。而有些不同名的书却有可能是同一本书的不同版本。凡此等等,作为做精、做全、做细高校教材的开始,目录工作实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再次,高校精品教材开发是一项长期性、战略性的工作,要做好这项工作必须要有长抓不懈的思想准备,这是由两方面决定的:第一是高校教材的品种繁多,即使是抓重点科目,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做全、做细的,有些科目会不断地细分、细化;第二是高校教材本身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的科目被取消,也不断有新的科目产生,而大部分科目内容是随着科技进步、人们认知范围的扩大及认识的深入而不断更新发展的;第三是高校教材需要不断地维护,随着信息化、网络化时代的到来,知识更新的周期愈来愈短,原有的教材也要及时修订,注入新的理念。

高校教材开发已被越来越多的出版社所关注,高校教材市场的争夺将越来越激烈。总之,对于大学出版社来说,经过多年旧体制下的发展,在面临重大体制改革的今天,认清自己的实力,在总结已有成果基础上搞好高校精品教材建设,具有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

(曾建林)